西南人文书系



三星堆

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

陈德安　魏学峰　李伟纲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类号 26.32761
著者号 C390
登录号 34693
K872.71

西南人文书系
Humanity Culture Books in Southwest China



三星堆

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

陈德安　魏学峰　李伟纲　著

Sanxingdui

Explore the Centre of Civilization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River

by Cheng deyan Wei Xuefong Li weigan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策　　划：张问渔　刘长久
责任编辑：张问渔
封面设计：邹小工　刘　民
版面设计：戴雨虹

西南人文书系
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
陈德安　魏学峰　李伟纲　著

出　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印　刷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16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225—6/K·583

CDJ0005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99. 1. 5
考古书店

出版者的话



西南人文书系

“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常常是互用的，不仅汉语如此，西文亦然，均是指人类能力的高度发展。英国格林·丹尼尔将世界文明分为6大文明，德国斯宾格勒举出8个主要文化，英国汤因比列出26个文明，其他还有7个、9个、11个、12个文明等不同的说法。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当代的主要文明有7个，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他指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显然，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乃至科技无不涉及文化问题。因此，今天的人文和科技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均日渐注意从文化切入来深化本学科的研究。

自西汉太史公的《史记》到清代乾嘉学派，二千余年来，不仅以中原汉文化独尊，“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而且把中原周围的四方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鄙之为“四方皆荒”。中国西南地处边陲，自然被视为“蛮荒之地”。由于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故向来多言“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然而20世纪后半个世纪，长江流域考古的重大发现，证明长江流域同样有着悠久灿烂的原始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在西南地区的云南开远、禄丰出土的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其时代距今约有800万年。此外又在云南元谋发现早期直立人化石，时代距今170±10万年（另说时代不早于距今73万年，可能为距今50～60万年）。以此说明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带。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西南各省区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存达五十余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相当丰富。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遗存，震惊海内外，璀璨的古蜀文化业已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此后，巴蜀一直在中国西南文化中举足轻重，滇、黔、桂、藏也以其独特的文化异彩纷呈。

China



西南人文书系

出·版·者·的·话

一部完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文化史）并非仅仅是以中原汉族为本位的精英文化的历史（以往的著述大多如此），还应当包括汉族民间文化（即精英精典知识和思想之外的一般知识和思想）以及除汉族之外的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才能构成多元整合的中华文化。鉴此，我们推出“西南人文书系”，旨在全方位地拓展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力主发前人之未发，其次，尽力深化前人之已发。抚今追昔，继往开来。

图文并茂是“西南人文书系”的一大特色，文字揭示各书所描述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客观性、知识性、学术性并重；图版形象地展示其文化的多姿多彩，既让读者从中领略其风韵，又给读者以审美享受。现推出几本开拓性著作，欢迎西南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多提建议，同时也欢迎惠赐有关西南人文研究（并配图片）的力作、新作。让我们共同构建新的西南文化，为中华文化的明天谱写新的乐章。

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文编辑室

1998 年 9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西南人文书系

1929年春，从广汉月亮湾出土一坑玉石器开始，广汉三星堆渐渐地引起了人们重视，并把它作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视点。60年间，几代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踏寻、探踪。198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单位对三星堆古遗址进行了连续数年的科学发掘。特别是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礼器、玉石礼器、金器及象牙、建筑遗迹等，并勘明了几段古城墙遗迹。各方面证明三星堆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是早期蜀人的都邑所在。它向世人展现三四千年前长江上游文明中心——古蜀文明的辉煌。这项被称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

众人所知，古蜀史迹在先秦文献中记载极少，还杂有神话传说，这就使古蜀国的历史更为扑朔迷离。三星堆遗址以及建国以来四川省内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打开古蜀王国的大门找到了路径。这些突破性的成果，不仅在我国考古史上，而且在人类文明史的探索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以三星堆为核心所形成的，有明显地域范围的古蜀文化区所特有的文化，正是一本待人解读的丰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以及文明演进的踪迹。

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从事考古和文物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的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主持者，有的是矢志于古蜀历史控索的研究者，他们分别就自己的心得，在共同切磋的基础上撰成此书。在这本书中，他们总结了前辈学者以及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能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所以得出的许多结论是可信的。在全国启动夏商周断代工作的今天，三星堆遗址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无疑为这项工程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上游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依据，也为本地区建立有序的考古学标尺做出了贡献。

马家郁

China

三星堆文化研究论著要目
（1936～1997年）

葛维汉：《汉州发掘报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

戴谦和：《四川古代石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1936年。

林名均：《广汉古代遗堆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3卷7期，1942年。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

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第8期。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期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六章第二节《杜宇时代的蜀国》及第九章《蜀的社会经济》，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

宋治民：《关于蜀文化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沈仲常、黄家祥：《关于广汉土坑出土石璧的认识》，《成都文物》1986年第4期。

陈德安、陈显丹：《上古巴蜀文明的重大发现——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林向：《巴蜀史研究的新篇章》，《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

闵云森：《三星堆：璀璨的古蜀文化遗址》，《四川日报》1987年4月18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白建钢：《四川广汉出土商周青铜雕像群》，《美术》1987年第2期。

陈显丹、陈德安：《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林向：《三星伴月话蜀都——三星堆考古发掘琐记》，《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

范小平：《三星堆雕像群渊源的几种假说》，《德阳报》1987年9月26日。

沈仲常：《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文物》1987年第10期。

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

范勇：《蜀族起源探索》，《四川大学学报丛刊》（35）1987年。

范小平：《从“纵目”谈起——兼论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人面像》，《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15日。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广汉市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资料选编》（一），1988年。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人物造型艺术初探》，《文物天地》1988 年第 1 期。
范小平：《古蜀的系列青铜人雕像》，《美术》1988 年第 7 期。
林向：《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遗存初析》，《成都文物》1988 年第 3 期。
范小平：《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四川文物》1988 年第 6 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2 期。
金勖琪：《三星堆遗址——半世纪以来川西考古最重大的发现》，《瞭望》（海外版）1988 年第 1 期。
陈显丹：《牙璋初论》，《四川文物》1989 年第 1 期。
宋治民：《早期蜀文化的再探讨》，《成都文物》1989 年 1、2 期。
张明华：《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 年 6 月 2 日。
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 年 7 月 21 日。
段渝：《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先秦史研究动态》1989 年 3、4 期合刊。
陈德安、罗亚平：《蜀国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 年 9 月 15 日。
段渝：《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又一个起源地》，《社会科学报》1989 年 10 月 19 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广汉市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5 期。
孙华：《巴蜀文物杂识》，《文物》1989 年第 5 期。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 年第 5 期。
董其祥：《参观三星堆遗址后的随想》，《巴渝文化》第 1 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蒙默：《四川古代史稿》第一章第一节之一《蜀王传说与成都平原青铜器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佟柱臣：《巴与蜀考古文化对象的考察》，《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辑（1989 年）。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辑。
伊利莎白·C·约翰逊著，石应平译：《商人礼仪艺术中的萨满教特征及对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的推测》，《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辑。
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罗开玉：《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关系初论》，《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杨荣新：《早期蜀文化与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徐学书：《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探讨》，《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巴家云：《三星堆遗址所反映的蜀人一些宗教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辑”。
范小平：《广汉商代纵目青铜像研究》，《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孙智彬：《三星堆遗址性质补证》，《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季智慧：《神树、金杖、笮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张善熙、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的贝币试探》，《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晓昆：《三星堆遗址社会性质初探》，《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1989 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段渝：《古蜀文明富于世界性特征》，《社会科学报》1990 年 3 月 15 日。
宋治民：《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1990 年第 5 期。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四川文物》1990 年第 6 期。
孙华：《蜀人渊源考》（续），《四川文物》1990 年第 5 期。

陈德安：《浅释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边璋”图案》，《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1990年。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巴家云：《三星堆遗址青铜“纵目人”面像研究——兼和范小平同志商榷》，《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宋治民：《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探讨》，《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1991年。

幸晓峰：《略论古巴蜀艺术的主要特色——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珍品谈起》，《艺苑求索》1991年第3期。

雷玉华：《巴蜀地区青铜文化的两个问题》，《成都文物》1991年第4期。

葛岩、凯瑟琳·M·林道夫著，吕公义译：《三星堆：中国西南新发现的青铜器时代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

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段渝：《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李学勤：《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李复华、王家祐：《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宋治民：《从三星堆的新发现看早期蜀文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陈显丹、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文化特征》，《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敖天照、刘雨涛：《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林向：《蜀盾考》，《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骆宾基：《三星堆出土的古蜀“龙护柱”族标考》，《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陈德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玉石器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李天勇、谢丹：《璋的考辨——兼论三星堆玉器》，《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巴家云：《试论成都平原早蜀文化的社会经济》，《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晓闻：《巴蜀时期的陶器》，《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邱登成：《金杖神树与古蜀祖先崇拜》，《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有害锈”的分析和研究——兼谈保护问题》，《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杨小邬：《浅淡三星堆出土金面铜头像的修复工艺》，《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罗曲：《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文化密码试解》，《文史杂志》1992年第2期。

庄文彬：《三星堆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传播的源流》，《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黄家祥：《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三题》，《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朱伟：《湮没三千年的奇迹——“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文汇报》1992年5月5日。

敖兴全：《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文史杂志》1992年第3期。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研究笔记》（连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6~9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向：《说盾：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杂考》，《成都文物》1992 年第 1 期。
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说”唱异——兼谈鱼凫和杜宇之关系》，《四川文物》1992 年第 5、6 期。
幸晓峰：《广汉石磬和古巴蜀磬乐》，《四川文物》1992 年第 6 期。
曾湘军：《广汉三星堆大耳人像与傩耳习俗》，《文史知识》1992 年第 11 期。
屈小强：《西南各民族先民竹图腾崇拜及其遗存》，《贵州文史丛刊》1992 年第 4 期。
文昌：《“三星堆”青铜器刍议》，《成都文物》1992 年第 4 期。
季智慧：《三星堆·巫文化·夏文化》，《文史杂志》1993 年第 1 期。
周群华：《从考古和文献资料看巴蜀文化的内聚和外衍》，《四川文物》1993 年第 1 期。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钱玉趾：《三星堆突目阔嘴青铜人面像新解》，《文史杂志》1993 年第 3 期。
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台北）1993 年第 2 期。
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 年第 3 期。
陈显丹：《四川广汉三星堆陶塑动物》，《文物天地》1993 年第 2 期。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四说》，《成都文物》1993 年第 2 期。
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若干问题的辩证》，《四川文物》1993 年第 4 期。
段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93 年第 2 期。
缪永舒：《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文化意识与艺术特征》，《四川文物》1993 年第 4 期。
屈小强：《从考古发现看古蜀人的音乐歌舞艺术》，《天府新论》1993 年第 5 期。
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若干问题的辩证》（续），《四川文物》1993 年第 5 期。
莫洪贵：《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的研究》，《四川文物》1993 年第 5 期。
刘光曙：《试论三星堆海贝来源及影响》，《四川文物》1993 年第 5 期。
敖天照：《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四川文物》1993 年第 5 期。
张策刚：《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溯源》，《四川文物》1993 年第 5 期。
德阳市钱币学会秘书处：《德阳市钱币学会成立大会暨三星堆出土海贝与西南丝路货币经济研讨会综述》，《四川文物》1993 年第 5 期。
敖天照：《略谈三星堆海贝的来源》，《文史杂志》1993 年第 6 期。
屈小强：《试说三星堆文明的货币》，《成都文物》1993 年第 4 期。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范勇：《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与族属》，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王家祐、李复华：《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两个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张雄：《从夏商时期鄂西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谈“巴”“蜀”非相同族属》，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管维良：《鱼凫族探源与三星堆断想》，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杨铭：《试论氐与蜀的关系》，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黄晓东、曾凡模：《巴文化原生形态初探》，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段渝：《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美〕罗伯特·W·贝格勒：《四川商城》，雷雨、罗亚平译，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龙晦：《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李松：《广汉青铜人物群雕的美术史价值》，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范小平：《三星堆青铜人像群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形式初探》——兼与中东地区上古雕塑艺术之比较，

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日〕林已奈夫：《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杨凌译，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徐自强：《广汉、安阳祭祀坑比较研究》，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宋治民：《论三星堆遗址及相关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李安民：《论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非同一民族所为及相关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香港〕杨建芳：《早期蜀国玉雕初探——商代方国玉器研究之一》，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王永波：《试论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玉瑞》，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陈丽琼：《略论巴蜀货币》，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邱登成：《广汉三星堆出土金器管窥》，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江玉祥：《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钱玉趾：《巴族与蜀族文字考辨》，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刘士莪、赵丛苍：《论陕南城、洋地区青铜器及其与早期蜀文化的关系》，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魏京武：《陕南巴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蜀与商周的关系》，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王劲：《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杨权喜：《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郭德维：《蜀楚文化发展阶段试探》，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施劲松：《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霍巍：《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联系》，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为鱼凫旧都“瞿上”说》，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李伯章：《僰道考——兼述“古僰国”》，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肖先进：《三星堆的发现发掘与遗址的保护利用》，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刘新生：《三星堆出土陶器研究》，载《四川文物》1994 年第 2 期。

李安民：《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礼俗研究》，载《四川文物》1994 年第 4 期。

屈小强：《三星堆玉·石礼器中的璧和璋》，载《四川文物》1994 年第 5 期。

王纪潮：《三星堆纵目式青铜面具的人类学意义》，载《四川文物》1994 年第 6 期。

杨明洪：《纵目青铜人像的民族学观察》，载《四川文物》1994 年第 6 期。

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铜器的铸造技术》，载《四川文物》1994 年第 6 期。

林向：《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史延廷：《试探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 B 型玉璋》，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范小平：《论三星堆青铜面具及其古蜀图腾》，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李先登：《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之再研究》，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赵殿增：《关于重建巴蜀古史的思考》，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骆永寿：《论三星堆文化的原始宗教习俗及其社会意义》，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何志国：《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辨正》，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石应平：《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趋向的思考》，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敖天照：《三星堆蜀都古城古国探微》，载《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 1995 年版。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及相关问题》，载《四川文物》1995 年第 1 期。

王子岗：《三星堆文化是蜀文化的先声》，载《四川文物》1995 年第 1 期。

陈江风、周铁项：《也谈广汉三星堆玉璧的文化功能》，载《四川文物》1995 年第 2 期。

蔡苹：《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看当时蜀人的服饰特征》，载《四川文物》1995 年 2 期。

邹衡：《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俞伟超：《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伯谦：《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张肖马：《〈祭祀坑说〉辨析》，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苏永江：《广汉三星堆出土玉器考古地质学研究》，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赵殿增：《人神交往的途径——三星堆文物研究》，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燕芳、王家祐、李复华：《论广汉三星堆两座窖藏坑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载《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 年增刊。

范小平：《转形期图腾与三星堆文化》，载《中华文化论坛》1996 年第 1 期。

宋治民：《早期蜀文化与商周文明》，载《四川文物》1997 年第 1 期。

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载《文物》1997 年第 5 期。

赵殿增：《从“手”的崇拜谈青铜雕像群表现的“英雄”崇拜——三星堆文明精神世界探索之二》，载《四川文物》1997 年第 4 期。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时代性质的再讨论》，载《四川文物》1997 年第 4 期。

何志国：《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载《四川文物》1997 年第 4 期。

作者简介

陈德安　1953年生于四川三台县，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0年开始参加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1982年至今一直主持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曾应邀赴欧洲、日本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主撰《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掘报告》。发表有关三星堆研究的学术论文多篇。

魏学峰　1963年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班，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美术考古。1985年就职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任副编审。1995年调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助理，次年升任副馆长、研究员。四川大学兼职教授、四川历史学会理事、九三学社四川省委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艺术与文化》、《中国书法史》等。多次获社会科学类科研成果奖。生平被采入国内外多种名人录。

李伟纲　1955年生于四川自贡，当过知青、当过兵。先后毕业于电大中文专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本科及考古专业研究生班。1979年以来，曾任自贡市文化局团委副书记、副科长，自贡市文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处长，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1992年调任四川省博物馆总支副书记、副馆长，主管展览陈列、群工宣传工作。1988年晋升文博馆员，1996年晋升副研究员。主持过几十次大中型文物展览，九次获省、市优秀科研成果奖。曾参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等书部分内容的撰稿。

（本书摄影作者：江聪）



西南人文书系

目　录

第一章　三星堆文化概述　1

第二章　古蜀文明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5

第三章　三星堆古蜀早期文明概说　10

第四章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　17

第五章　从两个祭祀坑看蜀人的宗教祭祀礼仪　20

第六章　三星堆青铜器探微　23

第七章　件件珍贵的三星堆玉石器　40

China

第八章　璀璨动人的三星堆金器　46

第九章　地方特色鲜明的三星堆陶器　51

第十章　铜贝、海贝、象牙　55

第十一章　古蜀城市文明觅踪　57

第十二章　三星堆文物考古之美　60

后　记

第一章
三星堆文化概述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与研究迄今已有60年的历史。60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三星堆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已基本查明，这是一处由数十个文化点构成的若干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所组成的总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遗址的年代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长达2000年，经过六十年间的历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以及祭祀坑在内的重要文化遗迹，出土了大批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珍贵文物，“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事实表明，三星堆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中心遗址，因此被列为我国近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三星堆二、三、四期文化所代表的一支内涵丰富，自成体系，特征鲜明，文化程度高的区域性文化，无疑显示了三星堆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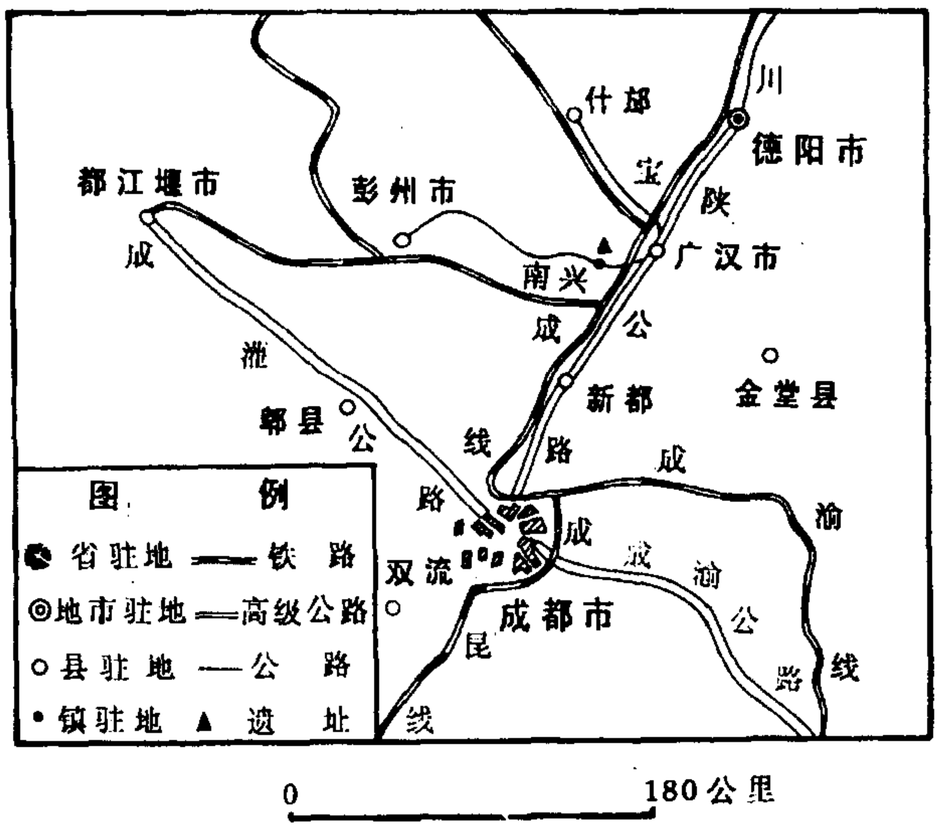


图1

遗址考察札记

一、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遗址西、南、东部都有古代城墙，而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之故。城址是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达3.5平方公里，大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居全国前列。对东、西、南三面城墙的调查和发掘，初步了解了城墙的体形，筑法，堆积层次和时代范围。东城墙长度一千七百余米，现存城垣长约一千一百米，顶宽二十余米，基宽四十多米，现存高度约4米。其结构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系用五花夯工分段夯筑法筑成。主城墙多为平行夯层，内侧墙和外侧墙则多为斜行夯层，主城墙顶部采用了土坯砖作为城墙建筑材料，为我国最早使用砖坯筑墙的例证之一。南城墙即被称为“三星堆”的一条土埂，墙体亦为人工修筑，长二百余米，宽约四十余米，残高6米，城墙外有深2.8米的壕沟。通过考古调查，在“三星堆”以南数百米处，还发现“城墙”遗址，可能是真正的南墙，有待正式考古发掘确认。西城墙以自然土丘为基础，加以人工夯筑修整，南北两端历年遭洪水冲刷毁坏，现存长度约六百余米，宽约四十米，高6～10米。城墙两侧的居住遗址非常密集，城中心还有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一批最重要的文物，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表明这里是以城墙作为依托和保护屏障的三星堆古城。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城墙始

筑于商代早期，使用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三星堆古城不太规整，城墙也未闭合，建筑方法既有其地方性的一面，又与中原商城有某些相似性，可能是以城墙和两河道互相结合而组成的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建筑体系。当时，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表明这里曾是中国商代的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中心。

二、密集的居住区和众多文化遗迹

在遗址群的其他几处文化层中，均发现了房屋建筑基址，现已揭露出五十多间，说明这里长期曾有大量先民居住，其中第一次发掘的 18 间房基，多为沟槽式基址，即在原生地面上开挖沟槽，槽中立柱，间以小木棒和竹棍作为墙骨，两侧抹草拌泥以成墙壁，颇具地方特色。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居多，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 15～30 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间进深 8.7 米，面阔 23 米，面积 200 平方米，而且数间相连，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能，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方形房屋中有柱桩干栏式小楼，圆形房子一般房面直径为 3～4 米，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凿洞立柱，用中心擎天柱支撑屋顶，建筑很有特色。

三星堆遗址还发现了窑址、墓葬、灰坑等遗迹。窑炉平面为心形，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米；墓葬为狭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无随葬品，这种墓葬大约是对特殊原因死亡人员的简单埋葬方法。

三、代表三星堆最高成就的祭祀坑

1986 年在三星堆外南侧先后发掘出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一号坑长 4.64 米，宽 3.48 米，深 1.64 米，坑口三方有坑道；二号坑长 5.3 米，宽 2.3 米，深 1.55 米。两坑修造规整，填平夯实，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满玉石璧璋、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这些文物原来都是宗庙内神像、祭器、祭品等宗教礼仪用器，由于某种原因，宗庙被毁，或更换神像，祭器被迁出，以祭祀的礼仪形式，审慎而有礼节地埋入坑中，因而较全面地保存了下来。祭祀坑中出土的上千件宗庙用器，有金、铜、玉石、陶器，是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迄今为止，代表了我们所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反映出多方面的社会情况，成为举世瞩目的文物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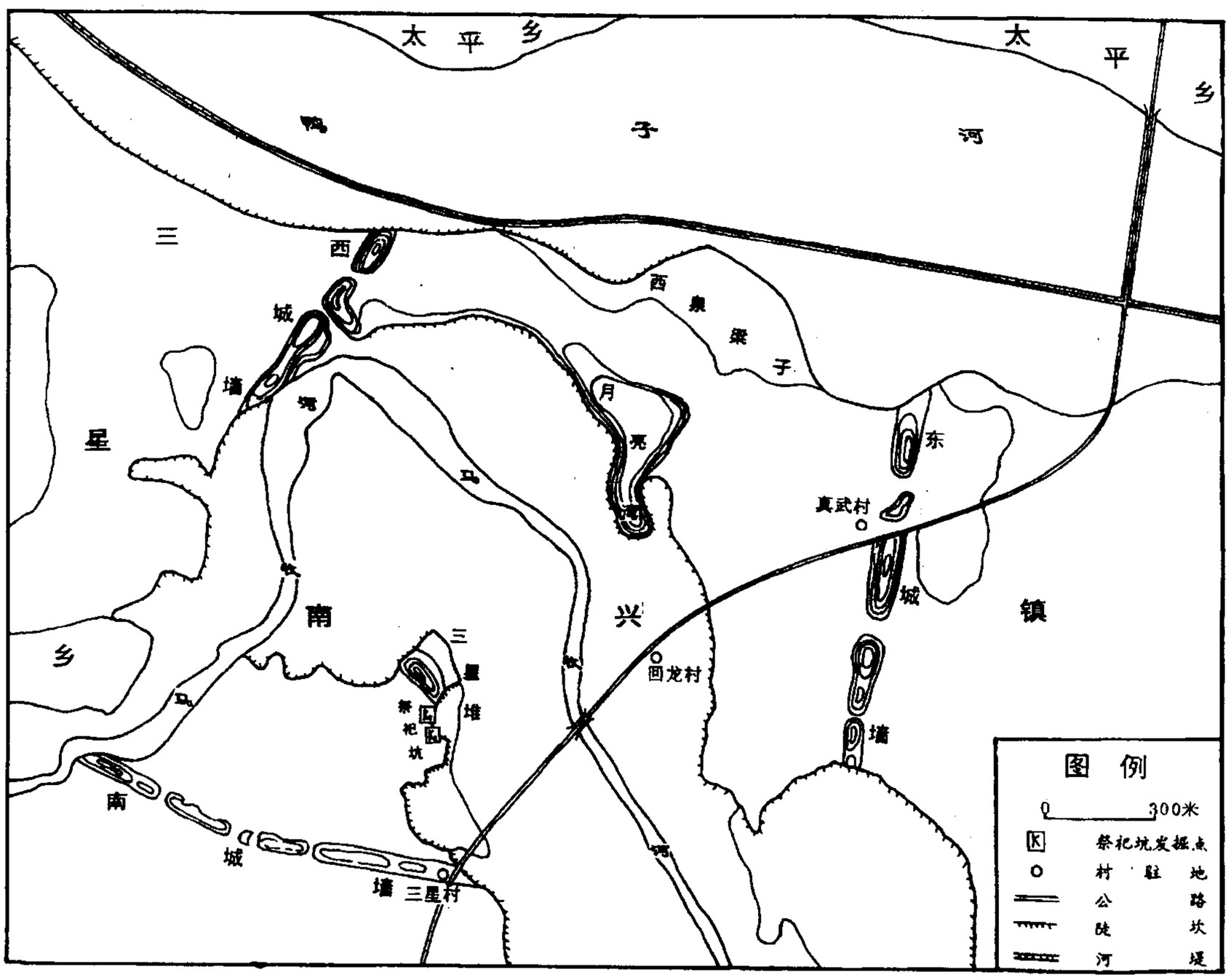


图 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